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13

中共党史出版社

数字资源
PDG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三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80199—607—7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②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146 号

书 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译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0mm×203mm 1/32

字 数: 553 千字

印 张: 22. 125

印 数: 1—11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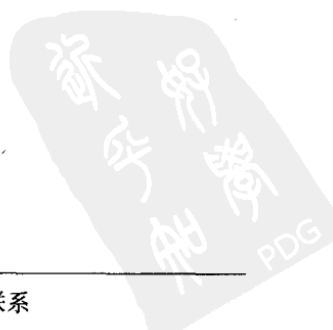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07—7

定 价: 298.00 元 (共五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1937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05年11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 者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三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即原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四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有关档案文件411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有些文件阐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间(1932年1月至2月)、在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发动过程中(1935年5月至8月),以及在有名的福建事变期间(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对中国事态发展所持的立场,有些文件披露了莫斯科对中国红军于1934年秋放弃中央苏区的计划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所持的态度,有些文件揭示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和莫斯科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发生变动的反应。这一卷首次全面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政治书记处、七大前存在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七大上成立的并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的问题的决议和指示。还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会议的记录。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卷首次发表了1932年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及远东局与1933年至1934年间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局之间往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1936年至1937年间往来的电报。该卷还收录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政治、军事代表给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书信、远东局成员给红色工会国际和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书信等,并且发表了共产国际档案中所保存的反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1年至1937年间工作情况的所有文件。

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2002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2003年上半年组织力量进行翻译。中译本分三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3、14、15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5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

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正文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在注释中则注明其名和父名的缩写字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 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

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贵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王昌滨(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李永昌(辽宁大学教授)；

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董友忱(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定。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四卷^①所收录的文件,继续阐述本文件集第三卷所阐述的莫斯科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对中共的政策。第三卷所阐述的是这个运动的初期,即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在这个时期,制定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的基本原则以及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并在华中和华南建立了较大的和较稳定的根据地和红军兵团。第四卷收录了苏维埃运动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文件,反映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本卷编者所分时期的对华政策。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931年秋至1935年七八月共产国际七大,虽然自1932年底起苏维埃根据地有过短时期(约一年)的扩大,但苏维埃运动开始遭到一系列失败,起先是华中的主要苏区丧失(1932年底至1933年秋),然后是华南的苏区丧失(1934年秋)。被政府军驱赶的红军部队遭到惨重损失,不得不开始先向西南地区转移,并于1933年在四川省建立了苏区,然后又向西北地区转移。在这个时期里,明确了(未作原则性修改)中共活动、苏维埃政策和红军行动策略的基本纲领性指导方针,部分地修订了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在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的斗争中利用他们的潜力,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因日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1926—1927),分两册,莫斯科1996年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3卷《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分两册,莫斯科1999年出版(以后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

本侵略的加强而国内爱国主义情绪和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潜在同盟军的隔绝状态。在第三个时期,即从共产国际七大至1937年七八月,莫斯科的对华政策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途径。根据这样的分期法,第四卷收录的文件分为两个部分。

在本卷所述时期,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要对这些过程的内容和后果作出评价,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在国民党旗帜下统一中国的过程,是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军政势力之间和在南京与地方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展开的。实际上,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前,虽然到30年代中期南京政府试图控制地方军政集团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尽管1931年秋日本占领满洲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但是直到1936年前,地方集团与南京的对抗表现为试图建立反蒋联盟,以及由著名的军政活动家所领导的一些部队发起反对南京及其政策的武装行动。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最大的集团——蒋介石集团控制了南京政权的中央政权机构和军队以及华东、华中的主要省份。与此同时,华北、西北和华南的许多省份仍由一些地方军政集团或一些高级军事指挥官所控制,他们只是名义上承认南京政府的最高权力。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蒋介石才得以把自己的亲信派去领导大多数省份。

流血的军阀战争的停止、南京政府实行的支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提高进口关税、向引进现代设备的中外企业家提供优惠等)、国家调控的加强、“民族复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引起了中国城市经济自1933年起特别明显的活跃、多数民族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和外国投资的增长。由于1935年实行了货币流通制度的改革,对粮食和纺织品贸易建立了政府管制,南京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

大增强了。1936年，南京政府着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规定由国家银行向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实行贷款，向从事采矿工业的中国企业主提供贷款。在战前的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最高的。

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就其部门和地域来说是极不平衡的。外国资本的涌入有助于提高用比较现代的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的比重，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例如在1935年，即使在传统的“中国”轻工业部门，外国企业的份额也占了全部纱锭的46%和织布机的52%。在金属冶炼和电力生产方面，它们的份额则更高得多。工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展实际上没有触动农村。国民党在20年代末提出的所有农业改革方案，如整顿对农民的捐税，都没有实现。与土地所有者有着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机构的人员、军队的将领和军官，以及传统的农村上层都反对这样做。30年代试图在农村实行的纯技术革新措施（改进的播种方法等）、建立农民合作社（主要是销售合作社）的尝试，由于缺乏资金和相应的干部，只收到了极其有限的成效。农村基本阶层的状况依然极其艰苦。农民的赤贫化和大规模饥荒的爆发成为中国农村的经常现象，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年代里尤为严重。

中国城乡状况的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共试图在城市里站稳脚跟并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努力屡遭失败的客观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为什么能够在农村，在南京统治地区和地方集团控制地区之间，甚至在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地区，建立和一直到1934年保持住自己的根据地（苏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那里培育有经验的军政干部，而这些干部后来在中共主力被迫向西北撤退之后，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条件下，成了中共力量发展壮大基础。

导致中共在城市里屡遭失败和它同工人基本群众丧失联系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一方面是国民党工会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是

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左”倾策略。

国民党建立亲政府的工会，制定国民党式的工会法，使那些有熟练技能的工人阶层得到比较稳定的工作和劳动报酬，就像用一道“长城”把这些阶层同不受工会法保护的广大劳动者阶层隔离开来，使这些阶层紧紧拴在政府周围，使共产党人的反政府口号和赶走“黄色”工会头子的号召不易被人接受。

中共脱离工人、脱离城市广大劳动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低估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宣传对这些阶层的影响，民族主义宣传是政府当局对居民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日本公然侵华之后。

众所周知，自1931年9月至1937年6月到8月，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华不断扩大侵略的时期。到30年代中期，已经十分明显，日本侵略集团已不限于占领东北(满洲)和保证自己在华北地区的绝对影响，而且企图奴役整个国家。日本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丧失民族独立的威胁，引起国内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情绪的发动和高涨，这种情绪逐渐波及不同的居民阶层，包括有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官员、南京军队中的将领和军官以及地方集团。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军政集团都在自己的政策中考虑到日本侵略行动不断加强的事实和国内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的高涨。然而，统治阵营内的主要势力实际上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前都未能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集团利益、地方主义利益或个人利益之上。

蒋介石集团认为，中国太弱，不能同日本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对侵略者展开人民战争的思想在蒋介石看来是格格不入的，此外，在南京各派和地方集团争夺权力的角逐中有使他丧失个人权力的危险。蒋介石及其亲信指望利用列强在华的矛盾，指望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实际上选择了对侵略者不抵抗的策略。

直到1935年，南京政府时而承诺同日本“开展坚决斗争”，时

而号召不允许采取未经批准的反日行动，乃至对反日行动进行镇压，以期不给新的侵略行径提供借口，这就阻止了零散的爱国主义发动转变成全国的运动。

蒋介石试图利用侵略威胁来把国家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镇压自己的敌人，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南京把中共力量看作是主要的“内部敌人”。同时，蒋介石利用“围剿”苏区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把自己的亲信派到从红军那里夺取来的地区担任行政长官。地方集团的首领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情况，他们批评蒋介石对侵略者，特别是对西南集团首领们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们的分离主义倾向。

此外，在地方上和在南京，亲日派也在活动，他们指望通过向侵略者作出新的让步的代价来在日本的支持下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

实际上，统治阵营内的所有派别都指望，一旦日本扩张的矛头指向苏联，或者引起苏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进攻威胁就能消除或者削弱。这种对事态发展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35年至1936年间，即蒋介石的代表同苏联外交官讨论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苏联如何帮助中国的问题时南京的立场。

本卷收录的文件表明，日本从占领满洲开始的对华侵略行动（满洲可能成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爱国主义反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和中国越来越多有影响的势力被逐渐拖入反日运动，成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重新审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重要因素。

在第三卷的前言^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提出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的缘由，阐述了斯大林、布哈林以及联共（布）和

①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文版第7卷，前言第3—26页。